

第一章

反右派鬥爭的遠因之一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一貫的成見和敵意

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不是偶然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候的一次猛烈的爆發；是中國共產黨和一同致力於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主要代表的民主黨派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候的一次猛烈的爆發。它雖然發生在 1957 年，但是其遠因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至少可以指出的有：第一，毛澤東對中國知識分子一貫的成見和敵意；第二，毛澤東早就有了的對中國民主同盟的敵意。

現在先說第一點。毛澤東從他政治生涯的開始，就對中國知識分子懷有甚深的成見和敵意了。現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最初發表的文本裏，是指知識分子為反革命或半革命的。後來編入《毛澤東選集》的時候作了大量的刪改。在日本竹內實編輯的《毛澤東集》裏可以看到這篇文章刪改的情況。從這些被刪去的文字裏，人們可以看到他當時的想法。原文裏有一段是講「反動派知識階級」的，他這樣說：

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之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財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數大概不出一百萬即四萬萬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運動中之死敵。（第一卷，東京蒼蒼社版 1983 年第 2 版，第 163 頁）

在被刪去的文字裏，毛澤東還將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被他指為右翼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以小地主子弟的資格在國內專門學校大學校讀書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國留學生的薰陶」（第 165 頁），只要國民革命的爭鬥加緊，他們「一定會站入帝國主義一邊，一定變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為我們正面的敵人」（第 165 頁）；即使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毛澤東也認為他們「也包含許多危險成分，斷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第 166 頁），談到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他以為「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但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第 172 頁表格）。這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不但被他命名為「反動派知識階級」的是革命的死敵，就是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包括其左翼），也都是革命的敵人。

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左傾的青年知識分子投奔革命，千里間關，跑到延安。毛澤東在 1939 年 12 月 1 日寫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這篇黨內文件批評了「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指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這樣說，首先是因為在實際工作中確實有此需要，也因為他看見了「資產階級政黨正在拚命地同我們爭奪知識分子，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各種方法收買和麻醉中國知識分子的嚴重性」。（《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 618-619 頁）雖說文件上這樣寫，可是在事實上知識分子在延安的處境也很艱難，整風運動、搶救運動的打擊對象大都是那些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著名的一例是王實味，他就是因為一篇〈野百合花〉而遭到殺身之禍的。

1949 年初，中國共產黨將在戰爭中取勝已成定局，3 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在向毛主席的報告中說：

中國革命將要取得完全的勝利，新解放城市的青年知識分子已經或將要大批地湧入革命隊伍裏，參加工作或學習。如何團結、教育、改造他們，使之更好地為人民來服務，就成為黨在目前必須善為解決的一個重要的問題。（《陳修良工作筆記 1945-1951 年》，東方出版中心 2015 年版，第 54 頁）

這樣就完整地提出了一個「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

1956 年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中說：「黨中央在全國解放以前和以後，都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問題，規定和執行了關於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第 133 頁）不言而喻，這是把知識分子看成一個有待團結、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異己的力量。說客氣一點，也只是一個有必要加以利用的異己的力量罷了。六個字當中，核心和重點是落在最末的「改造」二字之上。這個 1956 年的文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估計是這樣：「在現在的知識分子中，一般說來，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他們已經處於孤立的地位；此外，還有百分之十幾的缺乏政治覺悟或者思想反動的分。」這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加上缺乏政治覺悟或者思想反動的分，就要佔中國知識分子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了。由此可見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是多麼重要和必要了。

這「改造」是怎樣具體執行的呢？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簽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開始了在全國所有大中小學以至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的思想改造運動，歷時近一年。對於這一場運動，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作了這樣的估計：

經過思想改造，知識分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克服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想影響，提高了愛國主義思想覺悟，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資產階級思想，開始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但運動中存在着要求過急過高，方法簡單的偏向，使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感情受到傷害。（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頁）

這裏，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說到存在着偏向，態度可說客觀。只是這種高度概括的語句，對於它所說的「感情傷害」，並不能給人以較深的印象。身歷其境的過來人就說得具體一些。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教育學家董渭川說：

由於急切要求這些從舊社會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拋棄他們的舊的立場、觀點，早日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中要他們「排隊洗澡」，聽說那時教育部領導人的指示是，儘量用熱水燙這些人，只要燙不死就成。於是讓這些人在大會、小會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檢討，一面用廣播、大字報揭露他們的「劣跡」，一面發動許多青年黨團員（助教、學生）給這些人「搓背」。在檢討會上通不過，再跟到老教師的家裏去，觀察他們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語不合，第二天在檢討會中再加上新的罪名，甚至以莫須有的事實逼着承認。有些人幸而「過關」了，有些人一直留在「關外」。運動過後，領導者認為在高等學校裏把無產階級的紅旗掛起來了，而這些老教師認為蒙受了終生不忘的奇恥大辱。（董渭川：〈談高等學校中的黨群關係〉，據《六月雪》，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頁）

這也還是事後概述，更具體的，可以去看看過來人的日記。史學家顧頡剛1952年的日記中有如下一些記載：

聖約翰中【學】有一教師蔡姓，今年五十八歲，為了思想改造太緊張，中風死了。（7月7日）

思想改造，一定要寫文章說過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於我真是一難題，以向日予自覺是一不做壞事的人也。(7月13日)

作〈六十年來我的生活的總檢討〉二千六百言。(7月15日)

繼寫檢討二千言。(7月16日)

立三反、思想改造兩簿，想到即寫。(7月17日)

予在三反中是一個不重要的角色，本想不出什麼來，自聽了兩天的報告與提意見，居然想出十一條，然皆雞毛蒜皮也。蓋貪污浪費，在舊社會中本亦視為惡德，故予兢兢不敢犯，茲所提者皆平常不視為貪污者也。(7月19日)

作三反總結，討論收穫及缺點，並各報告貪污總數。……予所開貪污單，解放前一千二百餘萬，解放後四十八萬。予戲語劍華云：「可套《金剛經》語曰：所謂貪污，即非貪污。」劍華大笑。(7月24日)

到第五教室，聽王克強檢討，聲淚俱下。(7月21日)

李琦同志因本組同人認識不夠，批評不真切，幫別人提意見亦不足，破口大罵，真有「到此方知獄吏尊」之感。(7月30日)

各人所認貪污數字，先說不退，今又說要退，共產黨之言不可信如此。(8月2日)

學委會派來幹部，每盛氣凌人，一副晚爺面目，自居於征服者而迫人為被征服者。此與思想改造有何好處，至多完成任務而已。安得毛主席化身千萬億，解除此偏差乎？(8月8日)

聽李光信交代思想，未及半，即為李琦喝住。……光信為人，拘謹之甚。生平惟做教員，亦無為害人民之事實。思想交代，在彼實無可交代者。然而不能不交代，則惟有硬帶帽子，把惟利是圖，投機取巧，損人利己等往頭上套。李琦知其非也，不俟其說畢，即令停止改寫。此實難事，蓋彼如不套，便不得作交代矣。三反之時，不貪污不如貪污。思想改造時，則不反動不如反動，以貪污反動者有言可講，有事可舉，而不貪污不反動者人且以為不真誠也。好人難做，不意新民主主義時代亦然，可歎矣！光信已兩夜不眠，逼之過甚將成精神病，更可憐！(8月9日)

王善業第三次交代，畢，開互助小組討論，逼得他大哭。……以光信之簡單，且多悔過之言，而提意見者仍極多。渠已四五日不能睡不能食矣。（8月12日）（顧頡剛：〈日記中的思想改造運動〉，載《萬象》第一期，1998年11月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第42-70頁）

顧頡剛感覺到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就好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獄囚遇到了獄吏一樣。

另一位史學家鄧之誠1952年的日記中也有有關思想改造運動的記載。這時他在司徒雷登當過校長的燕京大學任教，這裏更是運動的重點。

晚，四系師生在舊穆樓百零三號教室開會，翦、聶二公自行檢討。（2月5日）

翦伯贊、聶崇岐都是史學家。翦還是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進步人士。所以鄧之誠日記中說：「檢討及翦公，則所未料也。」（2月3日）

鍾翰來言，昨聶檢討，黨部認為不滿，令其再行檢討，從政治背景追求。（2月7日）

一時開會，眾共批評聶，至三時半始畢，可謂嚴重。（2月8日）

下午四系討論會，閻簡弼暴露沈、聶辱罵領袖，群情奮激。由學校常務委員會開會，將沈、聶二人先行隔離看管。童駿狂悖一至於此，蓋天奪其魄矣，不勝憤悒。（2月15日）

學校宣佈沈、聶停職隔離反省。（2月16日）

昨日會場中，新聞系一年級學生高某，因其父高青山昔年被校中辭退，遂高呼：陸志韋跪下。（3月8日）（鄧之誠，〈思想改造時期的燕京大學〉，載《萬象》第一卷第三期，1999年3月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第90-103頁）

陸志韋是一位語言學家、心理學家，擔任過燕京大學校長。北平淪陷期間，因為支持學生愛國活動，曾經被日本軍方逮捕。這時，由於他同司徒雷登有甚深的關係，就成了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對象。在鬥爭他的會上，也有人趁機泄點私憤。

這些都是當時的紀錄，雖極簡略，也可見一斑，楊絳的小說《洗澡》就是寫這個思想改造運動的，對運動作了生動而又深刻的反映。總之，這個運動是以徹底摧毀知識分子的自尊心和正義感為目標，使之產生一種原罪感和負罪感。他的出身、教養、經歷、社會關係、世界觀……無一不是有罪的。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不過是才開始。那些震動不大的審幹、學習、思想批判，不去說它了。1955年緊接着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而開展的肅反運動，也是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關於這一場運動，本書第五章將要細說。

這一場肅反運動給知識分子造成了怎樣的傷害，前面引過的董渭川的文章是這樣說的：

這一運動所起的副作用：一是使所有的人（不光被鬥者）俯首就範，從此再不敢有任何異議，所以在運動過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就連很熟的朋友見了面，也只是談談天氣，再也不敢提到國事、校事，惟恐被別人記在賬上，說不定哪一天又挨整。二是在運動中群眾被發動起來，誰不積極就是不認真肅反，狂風暴雨，深文周納，用盡一切手段逼供，等到風息雨止，冷靜下來，尤其是領導上宣佈向被鬥錯了的人道歉以後，大家在良心上感到不安而難以自處了。不管怎樣，客觀事實的表現是傷害了群眾的相互團結。三是從那些年輕的黨團員看，他們受到了些什麼教育，是值得深思的。至少說，再要他們和這些舊知識分子團結在一道，就更困難了。可能有人說，這是有批評有鬥爭的團結，那就要問，團結的效果在哪裏？所看見的是，彼此間的牆更厚了！

中國共產黨執政七八年，執行知識分子政策的成果，就是造成了一道厚牆。在1957年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爆發之前，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之間，就是這樣一種關係。

黨曾經有意改善一下這種關係。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會上周恩來所作的主題報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目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要傾向是宗派主義。為了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第一，應該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第二，應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們

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當然，周恩來的這篇報告也沒有忘記提到另一種傾向，即只看到知識界的進步而不看到他們的缺點，因而不去甚至不敢去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工作。這樣，他就把兩個方面都說到了：在改善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也就是改善知識分子處境的同時，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方面還是有工作要做的。

周恩來的這個報告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費孝通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中說：「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們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難於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

第二章

反右派鬥爭的遠因之二

——毛澤東對中國民主同盟的敵意

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是一些熱心政治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組織。它成立的經過，1945年8月3日張瀾在招待外國記者時介紹說：

中國民主同盟是1941年2月在重慶正式成立的。它本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以外的若干黨派的一種結合。（包括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第三黨、救國會、職教派、鄉建派）我們一些發起人當時都是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的會員。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發生新四軍糾紛的事件，深深感到為促進抗戰勝利，實有全國團結的必要。但要推進全國團結，各黨派不可不先自行團結。同時又感到政治不民主，全國團結，抗戰勝利，必無可能。因此經過多度商討多次籌備之後，乃有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

本同盟成立以來，實受了不少的壓迫。為擴大基礎，加強力量，去年九月曾經決議改組；把民主政團同盟改稱民主同盟了。從那時起，同盟中不屬任何其他黨派的盟員就更加多起來了。（《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204頁）

這些不屬任何其他黨派的盟員，大都是中上層知識分子，他們不滿於國民黨的統治，對共產黨懷有好感。他們希望民盟成為進步的政治力量。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民盟就不止在西南和西北有了組織，在華南和華北的各大城市中也開始有組織了。並且在一些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中也建立了組織。羅隆基談過他的設想：「我個人對民盟的前途當時就有這樣的一種企圖，把民盟變成一個單一的統一的大政黨，成為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外的第三個大黨。」（《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第199頁）

1945年10月他為民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來算是民盟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起草的政治報告也說了這個意思：

為在各種實力對峙中，尤其是兩大黨派的對峙中，樹立一個獨立的中立的集團，便為那種客觀環境所要求。於是產生了這個民主黨派聯合體的同盟。民國三十三年經過一度改組，把民主黨派的聯盟改為廣大民主人士的聯盟，即改為有黨派與無黨派的廣大民主人士的聯盟。改組後的中國民主同盟，仍不失為一個具有獨立性與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團。所謂獨立性，是說它有獨立的政綱，有它獨立的政策，更有它獨立自主的行動。所謂中立性，是說它介在中國兩大政黨對峙的局面中，是兩大對峙力量組織中間